

789012

4066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哲学现代化丛书 (系列读物)

· 颤 动

——写在“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

李晓明 冯 平 主编



2
4066

789012

2
4066

颤 动

——写在“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

李晓明 冯 平 主编

云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卢吴乔

封面设计：鞠洪深

颤 动

——写在“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字数：149,000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0（精装1,000）

统一书号：2116·42 定价：平装 1.25 元
精装 2.35 元

谨献给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孜孜
以求历史真谛的人们

内 容 提 要

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国在改革和开放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已成为中外瞩目的课题。此书从现状出发，运用现代整体文化观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深入地考察了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客观变化，尤其是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两个层次，剖析了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展望了人类文明新浪潮和新科学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阐释了中国八十年代“二次革命”的历史涵义。值得关注中国历史命运的人们一读。

● 哲学现代化丛书 (系列读物)

○ 主编：黎克明

○ 副主编：程志方 张尚仁

○ 顾问：曾近义

○ 编委：李运生 李辛生

江家齐 颜泽贤 卢云昆

目 录

悄悄的脚步（代序言）

- 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场革命 1

无形的手

- 消费变革大观 18

增长着的张力

- 当代社会心理需要的演变 34

混沌

- 当今中国学府内外 51

新女性的剪影

- 社会变革中的中国妇女 74

怒放的心理之花

- 中国社会心理体系的变化 96

嬗变中的思维

- 传统思维模式的变革 109

不仅是游移和徘徊

- 当今价值观念展望 133

浮士德式的追求

- 当代道德观念的变化 153

震兆之霞

- 对观念变革的沉思 181

后记

194

悄悄的脚步（代序言）

——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场革命

历史的路在我们脚下延伸。

无论你对1976—1986年间中国社会运动轨迹的追思是满怀着眷恋、炽情，还是弥漫着惶惑、惆怅，历史悄悄的步履，终究已将每个中国人推到了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十字路口——人人面临着来自现实和观念的挑战。

虽然，眼前的一切不象呼啸而过的飓风，但人们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颤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以管理体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不仅波及民族生活地表的各层，而且还在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从而蕴育着一次新的构造运动。社会的生活、时代的精神和人们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朝着新的模式变迁。现实，是这样咄咄逼人。它催人审视，迫使着每个人对正在萌生中的民族文化新体系认真加以思考，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作出抉择！

《颤动》是由一群立足于中国现状，思索和探求着未来的青年人合著的。在古老的罗马

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头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记取历史的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庇护一度繁荣强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过去是今天的逝去，明日则是今天的继续。人若无视足下的现在，纵然对逝去者了如指掌，对未来者洞若观火，可这种高明的求索又于社会和个人何益？故此，《颤动》的立足点是1986年中国的现状，由此向历史和未来两个维度展开。

从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时空出发，描述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正在或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深沉的历史感和理性思维揭示这些变化的客观必然性和内在联系；通过中西文化演进的比较，剖析和探求振兴中华的历史必由之路，冲决传统观念的情性网罗，展望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新浪潮中崛起的宏大前景；把今日中国改革的成就和历史进步的趋势，凝聚成诱生新文化、新意识、新观念体系的晶核，这就是《颤动》一书的宗旨和使命。

当中华民族刚刚从料峭春寒中走出，人们曾预言，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导致一场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广泛深刻的革命。而今，几经波折反复的社会改革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一条势不可挡的大河，它正推枯拉朽地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巨轮疾进。没有政权的更迭，没有流血，也没有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然而，却名符其实地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八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一场悄悄的革命。

按传统观点来看，革命通常导致社会所有制的改变，至少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和统治权力的更替。中国现代的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进行的。其中心内容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改变和现实经济关系的调整。它既不凭借对抗方式来解决矛盾，也不截然呈现出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称之为革命，似乎令人纳纳不解。其实，所有制的改变、政权的更迭，只是社会革命的阶段性特征或狭义理解，而每一时代社会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内涵和基本特征。显然，政治、暴力并不是革命的唯一手段和途径。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它们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自身职能的调整，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实现。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种趋势将愈益显著。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将得到更加充分有力的证明。

从时代条件来看，中国的改革正时逢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新浪潮。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遗传工程为基干的信息革命，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新机遇和新挑战，规定着变革中的经济体制，必须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创造新生产力的强大机能；而且将导致中国几千年来生成的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心理体系彻底崩溃，并强制着改革中孕育萌生的民族新文化体系向开放性结构演化，从而引起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一次重大的构造运动。这就是“二次革命”真切的历史涵义。

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即人与对象世界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换活动有三种基本形式：人与对象世界之间实体层次的交换活动、能量层次的交换活动和信息层次的交换活动。虽然三种层次的交换活动彼此交织、渗透和转化，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它们又各居不同地位，从而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次峰峦起伏的浪潮，在生产力不发达

的年代里（包括原始时代、农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实体和能的控制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具有一种封闭性和半封闭性的特征。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代，人们通过信息来控调与对象世界之间实体和能的交换活动。信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和财富（包括科学技术，各种知识等等）与以实体、能为形态的社会资源和财富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共享性，这就是说，时效参数对信息开发的价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信息的价值又可以多次或同时为众多的人所利用，因此，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必然是有着充分发展的信息流通渠道和反馈功能的开放性社会。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那种封闭性的社会文化体系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要演变成一种开放性结构。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璀璨的文明。在地理上，除东临大海外，她三面均为山脉和沙漠环绕，因此，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几乎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在心理上，早熟的亚细亚文化，也严重地妨碍着中华民族对外部文明的认识和接受。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被切断过的文明，它没有象欧洲那样揉合亚洲、非洲、地中海和拉美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开放性体系，客观上带有一种封闭性质。加上历史上的统治者又惮思竭虑“面南之术”，千方百计把社会信息生活紧缩在最低水平，以愚民政策和科举制度来排斥科学知识的发展；以闭关自守、封建锁国的政策，使本来传播和交流就很困难的异邦文明，不是被充做宫廷珍奇，就是被当作伤风败俗的祸水拒之于国门之外，使之难以渗入民族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因此，延续了四千多年之久的中华文明是在一种亚细亚文化环境中，在一种封闭单一的模式中生息繁衍的，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

当然，一百多年来西方异族文明的某些要素和成份也开始渗透和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

戊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生活的舞台发生过急剧而令人眩目的变化，但为什么人们总是感到民族文化体系中历史积淀的种种惰性因素，在压抑、窒息着民族的活力和生机呢？我们以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体系中都存在着深层和表层两种结构（注意：它们的区分不等同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深层结构是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硬核”。它既不易为外族文明所同化，也不易为本民族社会经济、政治、道德、伦理的变迁所改变。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它凝聚着该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并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因此，它对民族文化的演进，具有调整、定势和控制的作用。表层结构是各民族文化传统的“软组织”、“保护带”。其使命在于通过各种同化、变形的功能，顺应各个时代出现的某些矛盾、危机和挑战，适应和组织新的文化环境，发挥民族文化传统的“免疫”机能。以表层结构之变来维系深层结构之不变，以深层结构之基本不变来应付环境之万变，这就是社会文化运行的客观机制。中国近代以来虽发生着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变迁，但它们主要发生在表层结构，而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特征并没有重大变化。因此，实现由亚细亚封闭性文化体系和社会向现代开放性文化体系和社会的转变，客观上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改革——“二次革命”的基本纲领。

从生产模式来看，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造成封闭性经济结构的某些政治原因，但这种封闭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被摧毁。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完成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转变；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全民所有工业体系的发展，也不意味着一个开放性的生产——消费社会系统的确立和完成。尤其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某些特殊的国际环境使“小而全”的小生产原则，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中得到了放大。我

国旧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主要是以地方自然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特殊历史的积淀和混合物，它明显地保留着旧式农业社会的遗风。其生产活动结构中的信息控制、信息反馈和信息处理的水平很低，但单向线性（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和封闭性的特征却很强。这种体制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现存生产结构的现代化，而且常常孽生出一批脱离现实经济运动的官僚主义者和机构，成为党内一切不正之风的经济根源，成为一切因循怀旧、保守无为思想的社会根源。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进行的经济改革，针对的是一个“死”字，目标在于一个“活”字。一方面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建立开放性的价格体系，搞活城乡经济；另一方面则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往来，建立经济特区，大胆引进外资，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是说，要以内外的双重开放措施来改造我国现有的生产结构、流通结构和消费结构，促进我国现代生产开放性控制系统的确立和形成。

从生活模式来看，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生活方式、消费原则和情感色彩，决定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民主革命胜利后，农民虽然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但旧式农民以土地为中心，以农业季节为时空参照系，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伦理纽带，以父亲家长制大家庭为单位的基本生活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作为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主要原型，它与我国僵化的经济体制，与反映小农意志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结构相融合，便凝成了五十年代——七十年代那种安时顺世、守道安贫、松散平淡、毫无生气、单调畸形的都市生活模式。人们生活中的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情感消费，在一种极度封闭的环境中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束缚。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业生产逐步摆脱了粮食种植的单一类型，迅速向商品化、专业化、联合化、多种经营和多元结构方向发展。农村农工商联合体的出现，以及

农民办第三产业向城市的渗透，逐步瓦解着以土地为伦理基础，并依赖于土地的旧生活方式及其观念。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机械化、电气化和电子化的发展，逐渐把我国农民从与世隔绝、孤陋寡闻的原始信息环境中解脱出来，开阔了他们生活的视野。在初潮泛起的城市改革中，由于整个社会生产节奏的加快，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加，电子电气生活消费品对城市家庭生活的冲击和改造，中国现代都市生活开始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畸形模式，正在萌生一种与现代经济生活脉率相适应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生活新结构和理想体系，确立一种富有时代色彩的秩序感和平衡感。这种开放性的社会生活新结构和新模式，体现了现代物质技术奇迹与更高层次的人类自我实现精神的融合，反映了作为现代高频节奏生活补偿的物质和情感消费的需求，表现了现代中国人在生活中正蕴育着求知开拓、充满进取性的新人格。

从思维模式来看，具有源远流长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形成了富于辩证和发展的传统思维观。这种带有“活性”、“弹性”的思维模式毕竟又是以土地为根基，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二千多年来狭隘、封闭、保守的经济、政治、道德、法律和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积淀物。它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和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传统心理体系是相互适应的。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封建意识形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但传统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尤其是那种在平均主义意识中凝炼的敬畏守旧、不偏不倚、以“中庸”为至上原则的小生产思维性格；那种酒脱务虚的“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的哲学思想；那种“无改于文道”、因袭祖宗、“以不变应万变”的教条主义原则；那种党同伐异，以求形式一致、“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刀切”思想方法；那种脱离经验观察、排斥逻辑推证和公理化、形式化而固守直观思辨的致思途径等等，都严重地影响、侵蚀着我们党的思想肌体，弥漫于人们日常的思维活

动之中，并通过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破除的是平均主义思想和“大锅饭”式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灵活多变，随机调节的开放性管理方式。这实质上是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提出了变革传统思维模式的要求。随着改革后对外经济、文化的开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中国人的时空观、发展观、思维原则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科学相对性原理和系统方法的普及、反映进步原则的一维不可逆时间观念与广阔多层次的空间形象缜密结合，构成了新一代中国人的时空四维立体系统观、全球意识和效率观念。瞬息即变的现代文明生活，迫使人们放弃了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被动认识模式，确立和发展了以智力分析和开拓思维为特征的能动反馈认识模式。人们正力求运用整体性和最优化系统控制原则来认识和利用事物运动规律，预测其各种发展趋势以采取最佳对策。这将大大改造传统的思维性质，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推向时代的高度。

马克思说过：“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页）在人类文明发展第三次浪潮拍击下震醒、崛起的中国，正意欲通过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挣脱亚细亚文化的封闭模式，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放性体系。马克思深切期待的，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文化结构变迁，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中开始。来自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震波，正展示着“改革是二次革命”的真切历史涵义。

二

在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时代的观念体系主要属于表层结构的范畴，其生成、发展和转变既应当从社会物质生产

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中得到解释，同时也可以从本民族文化体系深层结构的变迁中得到说明。这就是说，人们在变革现实的同时也必然在改变着自己思维的产物。人们对生产关系、生活关系、思想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全面调整，一定会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中得到客观反映。但是意识和观念变迁的实现及其特征，又将受到本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从而使观念甚至整个文化结构的变迁显得格外地扑朔迷离。

与亚细亚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的经济、政治结构相适应，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也具有“大一统”强控超稳的结构特征。本来，封建生产关系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它本身缺乏把分散在各种不同地域的小农组织起来的力量。但在中国，在典型的亚细亚文化环境中确立起来，并支配着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中央集权政府，却利用儒生来组织官僚政治机构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利用儒教来统一臣民的信仰和国家学说以保持观念意识的统一，从而遏制分封制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遏制军事割据和限制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程度。中央集权政府不仅具有把小农社会组织成大一统帝国的能力，而且能把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耦合起来，形成一种封闭的反冲击、反进化的强控超稳机制，使早熟的中华文明滞留在中世纪水平。

从中国传统精神生活的深层结构来看，主客体分化发育不全和主体意识的畸形化，也大大强化了观念体系的封闭性和惰性。就传统意识的主客体分化而言，中国传统精神生活的核心是质朴有机的自然观和儒家的人际伦理哲学。由于私有制发展的不充分，古代民族的解体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民族精神生活中的种种神秘主义因素随之也被保留下来，并转化和升华为体现血缘宗法意志的伦理化世界观。古代氏族在图腾崇拜中形成的神秘主义集体表象被人格化了，形成了君权神授、天命神权的信条。天人浑

一的万物有灵论被政治化了，融合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中。因此，尽管从形式上看，是人及人际关系而不是人和神的关系支配着中国传统意识，但在实质上，人和神却是不可分化的。神在西方虽为彼岸的上帝，却具有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神在中国是天子，是真正的人，但却是不具有七情六欲、绝对至上的神。“尊天命”和“天人感应”的学说，严重地束缚着人们对自然、社会和思想现象的探索。客体的形象、属性、特征与主体主观的体验、神秘的情感和宗法的伦理交织和缠绕在一起，统摄着民族的思维 and 一切精神生活，严重地妨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主体自我意识的生成和健全。就传统的主体意识来看，个体性受到了群体性的严重压抑和排斥。在亚细亚社会中，个体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中都与血缘宗族群体、宗法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天地君亲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宗法情感的沉淀物，不但成为协调国家组织和宗法关系的基本理论，而且成为了社会精神生活和观念思维的基本准则。儒家的“三纲五常”体现的是家庭、国家和社会与个体的绝对对立，并且成为凌驾和超越在个体之上的关系。它不仅要求个体在行为上绝对屈从于“群体”，而且象梦魇般地压抑着个体的意识活动，使个体意识完全被包摄在不发达的、宗法性的群体意识中，使个体的观念和信仰无条件地受制于群体意识，造成了主体意识的残缺和畸形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思想似乎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归根到底它并不是个体能动性和群体能动性的统一。在宗法专制的亚细亚文化环境下，以“群体”、“社会”面目出现的整体性价值体系，严酷地压抑和剥夺着个体的自我意识。个体的自我意识只有交予更高的异己力量——即以自然的“天道”来对抗社会的“人道”，以思维的至上性来换取现实的真实性，以自我的虚无来补偿自我的渺小。这是中国传统意识中个体在心理上对宗法群体和